

# 辽宁北镇偏坡寺诸遗址性质的再探讨

陈术石<sup>1</sup>, 佟强<sup>2</sup>

(1. 辽宁省博物馆, 辽宁 沈阳 110167; 2.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辽宁 沈阳 110001)

**摘要:**辽代佞佛始于萧绰。建佛寺依附帝陵始于萧绰葬于辽乾陵后,寺院与陵墓相结合的陵区規制,影响到其他贵族墓葬,形成了墓寺相邻的葬俗。位于辽乾陵北的偏坡寺诸遗址为辽代皇家寺院——崇仙寺,崇仙寺建筑布局与同时代的密宗佛寺建筑布局相似,大殿供奉密宗大日如来,东配殿供奉药师佛,西配殿供奉阿弥陀佛,前有东钟西鼓二楼,骆驼峰顶有相当于法舍利塔性质的藏经阁,起尘沾影覆之功效,佑福山坡下的辽乾陵。辽代陵墓、佛寺、佛塔三位一体的建筑布局,是辽代中期以后皇族及贵族墓葬的一大特色,也是辽代崇佛、佞佛的具体体现。

**关键词:**辽代;乾陵;佛教;崇仙寺

**中图分类号:**K879.2 **文献标志码:**A

**引用格式:**陈术石,佟强. 辽宁北镇偏坡寺诸遗址性质的再探讨[J]. 沈阳建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6(2):109-116.

偏坡寺、骆驼峰、瞭望台、石板道遗址(以下简称“偏坡寺诸遗址”)位于辽宁省北镇市医巫闾山骆驼峰及骆驼峰东坡。从文献记载看,偏坡寺始见于清乾隆时期《钦定盛京通志》舆图,由此推测,偏坡寺之名当始于清初。除《钦定盛京通志》舆图外,其他文献无该寺院及遗址的详细记载。

2016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表文章,详细介绍了对偏坡寺诸遗址的调查及试掘情况,并在结语中指出:“推测偏坡寺遗址应始建于辽代早期……推测它可能是与辽代帝陵玄宫相关的建筑群址。骆驼峰遗址……推测这里可能是辽代高级贵族登高望远的场所。瞭望台遗址……推测其年代大致与偏坡寺遗址同时,认为二道沟和三道沟应为两个相互独立的陵区……内陵区地势高峻,是帝陵玄宫所在;外陵区地势低平,是高级陪葬墓区。两陵内陵区中都发现了高等级地上建筑

群,即琉璃寺遗址和偏坡寺遗址,推测它们可能与帝陵玄宫直接相关,为祭殿或享堂类建筑……骆驼峰遗址,可能与东丹王耶律倍生前曾在这片区域活动有关……三道沟发现了以偏坡寺遗址为中心的高等级建筑遗址群,其始建年代为辽代早期,推测三道沟为辽代显陵所在地。”<sup>[1]</sup>

2019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发表文章认为:新立遗址四合院建筑就是辽代帝陵玄宫前的祭殿……结合琉璃寺遗址所在位置,认为琉璃寺遗址很可能就是辽显陵的陵寝建筑址<sup>[2]</sup>。随着调查的深入和认识的提高,2019年的研究改变了2016年关于偏坡寺遗址为帝陵玄宫的判断,但没有深入地讨论偏坡寺诸遗址的性质和功能。

笔者曾于2019年10月亲赴偏坡寺诸遗址及新立遗址、韩德让墓、新立石刻、琉璃寺遗址踏查,现结合其他辽代帝陵的建筑构成

和功能布局,参考史料记载,对偏坡寺诸遗址的功能性质、建造年代等问题试作探讨。

## 一、偏坡寺诸遗址所处位置与辽代帝陵玄宫选址、陪葬墓选址及一般贵族墓葬选址的规律不符

目前辽乾陵玄宫所在位置已明确为北镇新立遗址的两座大墓,与韩德让墓志中所载“陪葬于乾陵之乙地”<sup>①</sup>相合。“琉璃寺遗址很可能就是辽显陵的陵寝建筑址”的判断,笔者也基本认同<sup>②</sup>。

偏坡寺诸遗址位于辽乾陵玄宫正北略偏西的骆驼峰顶峰及近山顶的东坡处,辽乾陵玄宫所处新立遗址海拔高度约为110 m;而骆驼峰峰顶海拔高度为635 m,偏坡寺、瞭望台遗址海拔高度在475~520 m,骆驼峰与新立遗址距偏坡寺诸遗址虽平面直线距离不远,但两地相对高差达360~520 m。如按原上山道路“石板路遗址”,从辽乾陵玄宫处登临偏坡寺遗址,身体强健者也需2 h以上方可登临。石板道坡度较大,即使辽人骑乘登临,亦需要1 h左右。

辽代祖陵、怀陵、庆陵玄宫所处位置,均“依”高大山峰而建,但并非建在高大山峰山体之上,更没有建在接近山顶的半山腰处,而是依靠玄宫后高大山峰,以之为屏障,建在高大山峰脚下的另一小山坡或微微隆起的高地上,小山坡与沟谷的相对高差较小。这样,既能防止玄宫被山水浸润,始终保持安全、干燥的状态,又使后人容易登临祭祀,同时也符合堪輿风水学上阴宅选址的要义。辽代的贵族墓葬亦是如此,至今尚未发现任何一处贵族墓葬葬于临近高大山峰峰顶的半山腰处。若将偏坡寺遗址视作辽帝陵玄宫所在或陪葬墓所在,则与辽朝普遍信奉的堪輿风水学不符。若此处非帝陵玄宫或陪葬墓所在,那么所谓

的“享殿、献殿”类的祭祀遗址则更无从说起,享殿、献殿类的祭祀场所,必须依附于墓葬,两者相邻相依。

## 二、偏坡寺诸遗址应为辽代大崇仙寺遗址所在地

偏坡寺诸遗址已排除其为帝陵玄宫及陪葬墓的可能,同时也排除了为享殿、献殿类祭祀场所的可能性,但它又确在辽代帝陵核心区域之内,当属于什么性质的建筑遗址?具备什么功能呢?笔者认为,偏坡寺诸遗址当为辽代佛教名寺崇仙寺遗址。其始建于辽圣宗统和末年(萧绰皇后葬于辽乾陵后)。现就这一判断的基本依据及相关问题试作申说。

### 1. 辽代早期就有奉安皇室先人遗像于佛寺并举行祭礼的传统,此为辽中期在陵墓之侧修建佛寺之张本

契丹在建立政权之前,受唐营州佛教的影响,已信奉佛教。辽太祖建立政权后,攻陷信奉佛教的渤海政权,迁徙当地僧人崇文等50人到西楼,建天雄寺安置。帝室常前往佛寺礼拜,并举行祈愿、饭僧等佛事,佛教信仰逐渐流行于宫廷贵族之间。会同元年(937年),辽夺取燕云十六州并掠夺了大量人口迁至辽地,燕云十六州原本佛教盛行,大量燕云信众的迁入促进了辽代佛教的发展。受佛教教义影响,在佛寺内奉安皇室先人遗像并进行祭拜,逐渐形成一种固定的礼仪。

《辽史》记载,天显元年(926年)“又于内城东南隅建天雄寺,奉安烈考宣简皇帝遗像。是岁太祖崩,应天后于义节寺断腕,置太祖陵,即寺建断腕楼,树碑焉”<sup>[3]</sup>。

辽圣宗受其母影响,亦崇信佛教,祭祀亡灵时,亦选择佛寺。太平元年(1022年)宋真宗上仙,薛贻廓报哀入境,辽圣宗“又诏燕京

①乙地:堪輿学阴宅风水,八卦宫位以八个卦名代表东南西北。除了八宫方位之外,还以二十四个方位判断吉凶,每个方位占15°,风水上称为二十四山。乙地即东偏南(方位角在97.5°~112.5°)。见万雄飞、司伟伟《辽代韩德让墓志考释》,《考古》2020年第5期。

②万雄飞认为,琉璃寺遗址即为显陵所在,见万雄飞《医巫闾山辽帝陵湮没千年后考古揭开“北镇”皇陵谜踪》,《中国国家地理》2020年第9期。笔者认为琉璃寺遗址所处区域,当为显陵陵区,但琉璃寺遗址非玄宫所在,极有可能是辽代望海寺遗址,玄宫位置当距琉璃寺遗址不远。

悯忠寺特置真宗御灵,建资福道场,百日而罢”<sup>[4]</sup>。

辽太宗时,作为皇室宗教活动场所的天雄寺和弘福寺,其地均距辽祖陵较远,非辽陵区范围内,祭祀起来,似有隔靴搔痒之感。但于佛寺内置先人遗像并在此祭祀已成为一种皇家礼仪,此为辽中后期于陵墓之侧修建佛寺之张本。

## 2. 辽代佞佛之始作俑者萧绰皇后,生前崇佛,死后极有可能在陵墓之侧修建佛寺

辽景宗继位不久,由于身体原因,不理朝政。皇后萧绰实际上掌控了皇权。《契丹国志》载,辽景宗“及即位,婴风疾,多不视朝。改元保宁。(戊辰)保宁元年(宋太祖开宝元年),辽大赦境内。刑赏政事,用兵追讨,皆皇后决之,帝卧床榻间,拱手而已”。“论曰:景宗爱在弱龄,中遭多难,高秋摇落,理之自然。政非己出,不免牝鸡之伺;祭则寡人,听命椒涂之手。其得虚尊而拥号,幸矣”<sup>[4]</sup>。《契丹国志》所载内容在《辽史·景宗本纪》中也得到了印证,“(保宁八年),二月壬寅,谕史馆学士,书皇后言亦称‘朕’暨‘予’,著为定式”。“(乾亨四年)九月庚子,幸云州。甲辰,猎于祥古山,帝不豫。壬子,次焦山,崩于行在。年三十五,在位十三年。遗诏梁王隆绪嗣位,军国大事听皇后命”。

辽圣宗对于佛教的态度,应分前、后两期。前期为统和二十七年(1009年)前,圣宗虽名为天子,然权力实操于萧绰之手。后期为统和二十七年萧绰“不豫”,于死前一个月方还政于圣宗。因此,统和二十七年前史载圣宗对佛教的崇信当实指萧绰,统和二十七年后史载,方是圣宗真正的信仰。关于萧绰称制时崇佛的记载有:“(保宁六年)十二月戊子。以沙门昭敏为三京诸道僧尼都总管,加兼侍中”<sup>[5]</sup>。“(保宁八年)八月癸卯。汉遣使言天清节设无遮会,饭僧祝厘”。“(统和二年九月)辛未,以景宗忌日,诏诸道京镇遣官行香饭僧”。“(统和四年秋七月)辛巳,又以杀敌多,诏上京开龙寺建佛事一月,饭僧万人”。“(统和七年夏四月)己未,

幸延寿寺饭僧”。“(统和九年春正月)丙子,诏禁私度僧尼”。“(统和十年)九月癸卯,幸五台山金河寺饭僧”。“(统和十二年夏四月)戊戌,以景宗石像成,幸延寿寺饭僧”<sup>[6]</sup>。

萧绰虽未有皇帝之名,然有皇帝之实。萧绰行帝之实达40年之久,其间之礼佛、敬佛、佞佛之事,皆出于萧绰。萧绰之前的辽太祖、太宗虽亦有礼佛、建寺记载,但基本是利用佛教,安抚民心,虽有信奉,但绝不痴迷。而辽朝的佞佛实始于萧绰。在《辽史·景宗纪》评语中,“沙门昭敏以左道乱德,宠以侍中。不亦惑乎!”评价的虽名为景宗,而实为萧绰。萧绰死后,“(统和二十八年正月)癸酉,奉安大行皇太后梓宫于乾州菽涂殿……夏四月甲子,葬太后于乾陵”<sup>[6]</sup>。因其生前佞佛,死后盼其来世,故建寺于陵之后山东坡,法音环绕,法影相随,尘沾影覆,破地狱之苦,得无上解脱,此为应有之义。此既可能是萧绰生前之遗嘱,也可能是圣宗对其母尽孝的具体做法。

## 3. 辽代“庐墓”所居之地,多与佛寺有关

辽代十分推崇“庐墓”之制。皇陵旁设置祭殿,“置官属职司,岁时表奏起居如事生”,并专门设置宫卫,“入则居守,出则扈从,葬则因以守陵”<sup>[7]</sup>。这些是指官方的设置宫卫守陵,而那些皇帝、贵族生前的妃子、近侍等,在其死后,也于陵墓之侧守陵。他们守陵时需要日常生活、居止,住在玄宫之侧专供祭祀的享殿、献殿之中,显然是不合适的。于是,在陵侧修建佛寺,并居住其中为逝者守护,日日诵经祈祷,既符合“庐墓”之义,又便于生活居止,且不逾礼制。“庐墓”礼佛诵经祈福的记载零星出现于辽代石刻资料中。

清宁九年(1063年)《故圣宗皇帝淑仪赠寂善大师墓志铭》载:圣宗崩后,其淑仪耿氏“旋属仙游奄促,窀穸告成,自誓守陵,以期末世而能未亡,兴叹如在申虔。迨及暮年,渐婴末疾。嗟人生之不求,观世事以何常。顿励精诚,恩求圣谕。桂裳罢饰,异姜后之脱簪;畦垄为衣,恭梁妃之落发”<sup>[8]</sup>。石刻中虽未明说淑仪耿氏守陵居止于何处,但她落发

为尼,卒赠寂善大师,其守陵居止之处当为庆州佛寺。

重熙三年(1034年)正月,“是月,皇太后还政于上,躬守庆陵”<sup>[9]</sup>。辽兴宗以守陵名义,将法天皇太后幽禁于庆州城,重熙十八年(1049年),法天皇太后建释迦佛舍利塔(庆州白塔)。史籍虽未明载法天皇太后在庆州居止何处,但从其修建释迦佛舍利塔可知,其在庆州为圣宗守陵时极有可能居止于佛寺。

寿昌二年(1096年)《耶律弘世妻秦越国妃萧氏墓志》载:“妃既违偕老,以哀恳闻上,请庐于王之窆所,是其愿也。帝用嘉纳……(妃)惟奉佛筵僧为施,以荐冥福,九载之余,一节而已……垂终之夕,诵佛作观而逝,盖平生习尚之然也。”<sup>[10]</sup>耶律弘世先于秦越国妃死,葬于庆陵陪葬墓中,秦越国妃萧氏“庐于王之窆所”“惟奉佛筵僧为施”“诵佛作观而逝”,其居止之所,当为佛寺。

上述石刻资料说明,辽代皇帝和贵族死后,其后妃有于陵墓旁守墓的传统,且守墓之地多与佛教有关。凡守墓者,必在墓侧,而墓侧之献殿不适合守墓人生活,对于后妃等遗孀,唯佛寺居止合适。

#### 4. 自辽中期始,于墓侧建佛寺,已见端倪

位于辽乾陵乙地的耶律隆运(韩德让)墓之西北方约1 000 m处小山梁顶上,建有一处辽代中期的佛寺遗址(即北镇新立石刻),在佛寺依山石开凿而成的石壁上,浮雕三世佛像。“及薨……葬乾陵侧,诏影堂制度一同乾陵。又诏诸处应有景宗御容殿,皆以隆运真容置之殿内”<sup>[4]</sup>。按文献记载,推测此当为韩德让墓之影堂,其体现形式则为佛殿。韩德让墓之影堂与佛寺合而为一附于墓侧,又反证辽乾陵亦当有佛寺与影堂合而为一的建筑群与陵墓相附。

圣宗崩而葬庆陵,“(景福元年秋七月)建庆州于庆陵之南,徙民实之,充奉陵邑”<sup>[9]</sup>。法天皇太后于重熙十八年(1049年)在庆州建释迦佛舍利塔(庆州白塔),《庆州白塔螭首造像建塔碑》题名有“庆州僧录

宣演大师、赐紫沙门蕴珪;庆州前僧录宣教大师赐紫沙门道清;庆州前僧录崇教大师赐紫沙门普勤”<sup>[10]</sup>等,这些记载说明,在庆州作为奉陵邑营建之始,就已有佛教寺院,并且已历三任僧录管理。

咸雍七年(1071年)《萧闾墓志》载:“以次岁夏四月十五日癸时,归葬于白霄香台山罔极寺之离位,故燕王、秦晋国大长公主先茔,合祔先娘子耶律氏之故穴。”<sup>[10]</sup>这里的秦晋国大长公主即辽景宗与萧绰皇后之女,辽圣宗姐姐观音女,嫁给了其舅舅萧继先。萧继先卒于统和二十八年(1010年),观音女卒于重熙十四年(1045年),观音女在世时,受其母影响,“熏修胜因,回向于佛道”<sup>[11]</sup>。在其病重时,“诸孙在旁,惻惻恳祷。焚香祝无边佛,设供饭无遮僧”<sup>[11]</sup>。罔极寺始建于何时,因何而建,史无记载,《萧闾墓志》出土于今河北省平泉市北五十家子镇蒙和乌苏村八王沟,说明该寺当在墓北的西山,推测罔极寺极有可能是修建于统和二十八年(1010年)萧继先卒后,观音女为其丈夫祈福所建。“罔极寺之离位”即罔极寺之正南,墓在南,寺在北。此与辽乾陵在南、偏坡寺诸遗址在北規制相似,恐怕不只是一种巧合。

耶律昌允生前崇信佛教,其卒于清宁七年(1061年),其妻萧氏于清宁八年(1062年)在墓东南修建佛寺。“天邑之北,仅余百里,则公之故地焉。岚凝翠叠曰佛山,山之足民屋聚居,若郡邑之大曰义州。今兰陵郡夫人萧氏主之,即太师公之妻也。太师毓庆戚闾,许心□佛。兴居暇日,以有思□凭高而肆望。延冈委迤,环甲第以远周;孤岫崔嵬,枕闲田而下廓。遂卜此地,肇开胜蓝。虽经始之谋有先,而考终之期奄速。夫人抱未亡之永恨,缉已坠之遗功……起于清宁八年庚子岁,成于咸雍八年壬子岁”<sup>[11]</sup>。耶律昌允墓玄宫位于距静安寺塔东南百米处,静安寺遗址在耶律昌允墓玄宫东南几十米处。三者成一直线<sup>[12]</sup>。

《宜州厅峪道院复建藏经千人邑记》载:



“厅峪者,乃辽时耶律详稳家之坟所也。其家世积善,遂卜胜地以建佛宫,置以藏经,其来也久。”<sup>[13]</sup>这里的厅峪者,即今朝阳北票市莲花山下耶律仁先家族墓地。

由上述石刻记载可隐约看出,自萧绰死后的圣宗后期始,于墓侧建佛寺,已见端倪。

## 5. 关于大崇仙寺及其寺僧志福、志达的文献记载

据历史文献及石刻材料,知医巫闾山辽代佛寺有医巫闾山东山崇仙寺和医巫闾山望海寺。关于崇仙寺记载有以下内容:

在《新纂续藏经》中收录大辽医巫闾山崇禄大夫、守司徒、通圆慈行大师、赐紫沙门志福撰《释摩诃衍论通玄钞》四卷,辽道宗亲为其作引文“朕闻如来启运,具四智以流徽……朕听政之余,留心释典,故于兹论,尤切探赜,今东山崇仙寺沙门志福,……勒成释摩诃衍论钞四卷……”<sup>[14]</sup>。从道宗帝序文中可知,志福为崇仙寺沙门,崇仙寺位于医巫闾山东山。

《辽史》关于志福的记载有:咸雍五年闰十一月己未,僧志福加守司徒。此外,还有医巫闾山僧志达(志福、志达,均为崇仙寺高僧大德,为“志”字辈,当为师兄弟)的记载:寿隆(昌)三年冬十一月戊午,以安车召医巫闾山僧志达。寿隆(昌)六年十一月丙子,召医巫闾山僧志达设坛于内殿。志福著述,除《释摩诃衍论通玄钞》外,还有《通玄科》三卷,《大科》一卷,见诸于朝鲜《义天录》。

金皇统六年(1146年)《大金燕京宛平县金城山白瀑院正公法师灵塔记》记载,正公法师为“中京乾州人,咸雍三年六月十五日午时降生……韶訖礼当州大崇仙寺僧口大师为师”<sup>[15]</sup>。

上述这些记载,可以明确两件事:一是崇仙寺在医巫闾山东山;二是崇仙寺在辽道宗年间,为皇家加“大”字寺院,规模宏大,有志福、志达高僧大德,影响较大。笔者认为,今北镇市内的崇兴寺辽代双塔,当是辽代晚期

崇仙寺在显州城下院所修建的双塔,辽灭亡后,在口口相传过程中,将“崇仙寺”讹传作“崇兴寺”。

今辽乾陵玄宫以北骆驼峰在医巫闾山脉中所处位置,称之为东山,最为恰当<sup>③</sup>。且偏坡寺遗址又位于骆驼峰之东坡,与“医巫闾山东山”的文献记载完全符合。今偏坡寺诸遗址规模宏大,亦符合道宗时期皇家寺院加“大”字的标准。

生活在金初至金中期的蔡珪曾作《医巫闾》诗一首:幽州镇山高且雄,倚天万仞蟠天东。祖龙驱之不肯去,至今鞭血余殷红。崩岸暗谷森云树,萧寺门横入山路。谁道营丘笔有神,只得峰峦两三处。我方万里来天涯,陂陀缭绕间风沙。直教眼界增明秀,好是岚光日夕佳。封龙山边生处乐,此山之间亦不恶。他年南北两生涯,不妨世有扬州鹤<sup>[16]</sup>。

其游医巫闾山诗中“崩岸暗谷森云树,萧寺门横入山路”句,反映出佛寺在崩崖之下,寺院山门在山脚下,寺在山上。遍观医巫闾山,位于崩崖之下的建筑遗址,唯偏坡寺遗址与之相符。

活动于金中期的赵秉文亦有《闾山悬岩寺观宇文公吴东山题名》,诗云:幽州之镇医巫闾,襟带辽碣吞玄菟。谁开青壁一万丈,坐我沧海之方壶。有泉声而飞,有松实而腴。云烟出没随朝脯,三百六十古精庐。云端削出金芙蓉,望海寺前列幢盖,镇山亭下罗笙竽。广宁太守来肩舆,今日之游差乐乎。问而不答心语口,高士例与山相娱。壁间题诗亦髣髴,记是诗人高蔡吴。山僧睨壁笑问吾,他山还有此客无。黄花老人醉骑驴,向天亦貌悬岩图<sup>[17]</sup>。

此文明确为闾山悬岩寺题名,在诗文中又提到望海寺,可见,悬岩寺非望海寺。悬岩寺,史无载,从诗文中见其有“三百六十古精庐”,其规模、体量可谓极大。其位置在青壁万丈之上,坐沧海方壶间,听飞泉,观松实,寺名“悬岩”者,纵观医巫闾山形、山势以及存

③辽时,崇祀的医巫闾山主峰当为望海峰或骆驼峰,而非位于北镇庙正西的今医巫闾山风景区。望海峰、骆驼峰位于今北镇庙之北,当为辽代拜山之根本,在此不详述,待以后另文论述。

有辽金遗址所在,唯偏坡寺诸遗址与此相契合。由此猜测,至金代时,崇仙寺已改称为悬岩寺。赵秉文所描绘的虽是金代时期寺院盛况,但金代在佛教方面乃延续辽代佛教传承,其建筑当为辽代佛寺建筑。

辽大安年间《上方感化寺故监寺澄方遗行碑》中有“医巫闾山望海寺僧即祁”题名<sup>[11]</sup>,可知医巫闾山除崇仙寺外还有望海寺,望海寺名与耶律倍读书的望海堂名相近,推测可能与东丹王之望海堂有关。笔者认为,今二道沟琉璃寺遗址极有可能为望海寺遗址,在此不详述。

### 三、偏坡寺诸遗址的建筑布局与辽代密宗佛寺的建筑布局相契合

#### 1. “尘沾影覆”的辽代坟塔寺建筑布局及辽代寺院建筑布局特点

辽代佛寺的建筑布局文献中少有记载,但仍可在出土的石刻中加以参详。前文提到的耶律昌允夫妇合葬墓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元宝山区美丽河镇大营子村北,其西北孤峰顶建有咸雍至大康年间的八角三密檐覆钵式砖塔一座,墓葬东南几十米处有建于清宁八年(1062年)、完工于咸雍八年(1072年)的静安寺。从《大辽义州大横帐兰陵郡夫人萧氏创建静安寺碑铭》(简称《静安寺碑》)可知,耶律昌允墓与静安寺、静安寺塔的营建顺序:耶律昌允安葬后,在其东南几十米处,选定寺址建寺,在墓之西北100 m处建塔,墓葬、静安寺、舍利塔为同步规划营建,具有坟塔寺合一性质。静安寺、塔早晚影荫坟墓的光影效果,应是特意设计的。

《静安寺碑》载寺内之殿堂布局:“中其殿,则曼荼罗坛,洎过未七佛明口高僧之像存焉;双其楼,则修冗路藏,洎圣贤诸传章疏钞记之部在焉。远侔东土,则震隅设绘者,乐(药)师如来;近拟西方,则兑位表形者,弥陀善逝。至于十方宝相,五佛粹容,皆极其端严,曲尽于妙。凡法堂僧宇,厨室困房,洎廐库客次,靡不备有。”<sup>[11]</sup>从碑文中,可知主殿乃密宗曼荼罗。除主殿外,静安寺设有藏经

楼二层,推测其应东西相对位于主殿之后。“震隅”药师佛、“兑位”阿弥陀佛,结合碑记中将静安寺塔所在山岗的位置称为“乾位”(寺之西北),可知碑记的描述方式是将地理的八方与后天八卦相合,其中的“震隅”即正东方向,“兑位”即正西方向。设药师佛于东,阿弥陀佛于西。此布局当为横三世布局。此外,还有法堂、僧宇、厨室、困房、廐库等诸多建筑,构成整个寺院。静安寺坟塔寺合一的精妙之处,在于其专门设计朝阳初升,寺影覆于坟所;夕阳西下,则塔影再荫及坟所的光影效果,此做法应源于对陀罗尼经幢“尘沾影覆”之功的追求。

始建于辽开泰九年(1020年)的义县大奉国寺,同样为皇家寺院。大雄殿是现存中国古代建筑中最大的单层木构建筑,五脊单檐庑殿式,面阔九间,供奉密宗主祀过去七佛。据元至正十五年(1355年)《大奉国寺庄田记》记载,其建筑布局为“义州大奉国寺七佛殿九间、后法堂九间、正观音阁、东三乘阁、西弥陀阁、四贤圣洞一百二十间、伽蓝堂一座、前山门五间”<sup>[18]</sup>。

除各佛殿宇外,辽代佛寺中,对于钟鼓楼建设十分重视。始建于辽圣宗时期,辉煌于辽道宗、天祚时代的安德州灵岩寺亦属道宗皇帝赐名的皇家寺院,是兴中府中密教佛寺的代表,名僧闾山忏悔、守司徒、通圆慈行大师志福、守太师通圆辅国大师法颐两位高僧都曾在此寺游憩修行。辽乾统八年(1108年)耶律劭撰文《大辽兴中府安德州创建灵岩寺碑》载:“有闾山忏悔、守司徒、通圆慈行大师志福,游憩于此。以其阙钟杵之音,失晨昏之傲,飞奏为请。天旨下俞,征良冶于远方,贸精铜于异域,垆橐一鼓,大器告成。逸韵叠击而丰隆,林薄四震于幽邈。设簏为饰,构楼以悬。”<sup>[11]</sup>

#### 2. 偏坡寺诸遗址为一完整的建筑整体,其建筑布局与辽代密宗佛寺的建筑布局相契合

偏坡寺遗址位于骆驼山东坡下,地势东西两侧高,中间低,平均海拔约500 m。遗址西部紧贴骆驼峰,南临西夹槽(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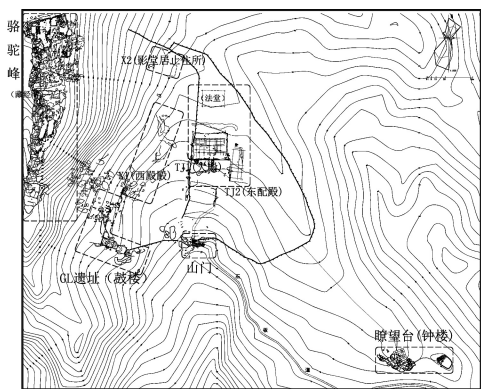


图1 偏坡寺诸遗址平面图

遗址总面积约 3.3 万  $\text{m}^2$ , 外围砌筑两道石围墙。门址在外墙南段中部。内墙环绕骆驼山东坡, 沿着东坡砌筑有多座建筑基址。外墙内有两组大型建筑基址, 二者相连, 整体呈曲尺形, 分别编号为一号、二号建筑基址。南门下临西夹槽, 南门外有石板铺砌的道路。一号建筑基址(TJ1)为主殿, 二号建筑基址(TJ2)为偏殿, 位于 TJ1 南部东侧。在一号建筑址西 20 m 高坡处, 建有一组建筑 X1 基址。在一号建筑址西北约 130 m 处, 有一组 X2 建筑基址。在一号建筑址西南, 南门址正西高台处, 有两方形 GL 建筑址。

骆驼峰遗址位于骆驼山顶, 海拔约 635 m, 地势险峻, 视野开阔。山峰顶部狭长, 南北走向, 其西侧为断崖, 东侧人工开凿出一个南北狭长的平台; 建筑物即建于紧倚山壁的平台, 其东侧为陡峭的崖壁, 崖壁之下是偏坡寺遗址。遗址分为南北两组建筑群, 均为高台基包石建筑。北组、南组建筑群之间有人工开凿的小道相通, 险要处在岩石上凿出台阶, 台阶旁边有方形或圆形槽孔可安置栏杆。在这两组建筑群的地面上都发现有较多碎小的布纹瓦片。

瞭望台遗址位于偏坡寺遗址东南角南部 160 m 处, 遗址坐落于天然岩石之上, 柱网平面为方形, 边长 7.3 m。

石板道遗址位于富屯街道新立村龙湾屯通往骆驼山的山沟内, 当地称“西夹槽”。西夹槽平面呈“Z”形, 全长约 2 km, 石板道遗

址由三道沟沟底一直通到偏坡寺遗址<sup>④</sup>。

偏坡寺诸遗址非单独存在, 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石板道遗址是通往偏坡寺、骆驼峰、瞭望台的行走道路, 其功能和性质自不必赘述。偏坡寺与瞭望台、骆驼峰, 因地形、地势自然因素, 分处不同地点, 看似 3 处独立性质的遗址, 实属一个整体的建筑群, 因受地势因素限制, 而建于不同区域, 具备不同功能。

笔者根据现场调查所见建筑遗址布局, 参考石刻记载的其他辽代密宗寺院布局认为: 偏坡寺遗址一号建筑基址当为辽代佛寺大殿基址, 布曼荼罗, 供奉大日如来、四方佛、过去七佛等密宗主祀诸佛; 二号建筑基址当为佛寺东配殿基址, 供奉药师如来; X1 基址区有建筑基址数座, 当为佛寺西配殿基址, 除阿弥陀佛殿外, 其余殿宇或为供奉景宗及萧绰之影堂; X2 基址区亦有数座建筑基址, 当为佛寺后殿基址, 其建筑功用除为法堂外, 其余建筑还可能是守陵后妃、近侍居止之所; GL 基址为两个相邻单体建筑, 位于山门之右侧十余米处高岗处, 按其方位当为佛寺鼓楼基址;

所谓的“瞭望台”遗址, 位于山门东南方位的山脊上, 建筑基址为边长 7.3 m 的正方形建筑, 开北门, 按其方位及形制, 当为佛寺的钟楼基址。骆驼峰遗址为崇仙寺的组成部分, 即佛寺的藏经楼所在, 亦即法舍利(佛经)所在, 因在骆驼峰顶峰, 再在其上建楼阁, 可视为佛塔性质, 具尘沾影覆之功效, 与耶律昌允夫妇合葬墓修建之舍利塔功效相同。此外, 偏坡寺、瞭望台从小环境来看, 非常宜居, 西、北有山挡冬季北风严寒, 缓坡向阳; 夏季周边有密林环绕, 清凉干燥; 依傍名山, 清幽之处, 非常符合佛寺建筑选址要求。

### 3. 偏坡寺诸遗址的始建年代

偏坡寺诸遗址建造时间为何时? 万雄飞根据其调查时发现的建筑用砖为“粗绳纹砖, 制作较粗糙, 绳纹粗且深, 麻绳纹理清晰可见”认为, “它既不同于辽金时期流行的沟纹砖, 也不同于唐代流行的细绳纹砖, 似乎处

④上述 4 处遗址介绍详见《辽宁北镇市辽代帝陵 2012—2013 考古调查与试掘》,《考古》2016 第 10 期。



于两者过渡阶段。这种砖的大量使用暗示了该遗址的始建时代为辽早期”<sup>[1]</sup>。

笔者在现场调查时亦发现了大量粗绳纹青砖,但笔者认为,该青砖与今朝阳东塔塔基构筑青砖及韩德让墓所用青砖,不论是规格尺寸还是绳纹特点都极其相似。韩德让墓建墓所用青砖为辽圣宗统和二十九年(1011年),朝阳东塔为辽圣宗开泰六年(1017年)重建,故偏坡寺遗址所用建筑青砖当为辽圣宗后期,其始建年代当与萧绰葬于辽乾陵时代相当。

需要特殊说明的是,崇仙寺从始建到最后形成遗址,也是经历了一个始建、扩建的过程,历圣、兴、道、天祚四朝,一直至金代,正如“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一样,偏坡寺、骆驼峰、瞭望台3个片区内的各单体建筑,其始建年代当不在同一时间。

#### 四、结 语

综上,笔者认为,偏坡寺诸遗址为辽代大崇仙寺遗址,该寺始建于辽圣宗后期,兴盛于辽道宗、天祚帝时期,并在金代沿用,改名为悬岩寺,毁于元末。清初时,在原崇仙寺废墟上,修建了偏坡寺,偏坡寺毁于清末、民国间。

有辽一代佛教盛行,而辽代佞佛始于萧绰。建佛寺依附帝陵始于萧绰埋葬于辽乾陵后,这一寺院与陵墓相结合的陵区规制,影响到其他贵族墓葬,形成了墓寺相邻的葬俗。辽代大崇仙寺为皇家寺院,其主修为密宗,志福、志达位列三公,是有辽一代的著名高僧。辽代陵墓、佛寺、佛塔三位一体的建筑布局特点,是辽代中期以后皇族及贵族墓葬的一大特色,也是辽代崇佛、佞佛的具体反映。

由于偏坡寺诸遗址至今未进行过科学的考古发掘,亦未在地表采集到证明其为崇仙寺的明确实物证据,因此笔者观点尚有待验证,期待早日对偏坡寺诸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工作,彻底解决偏坡寺诸遗址的属性、功能等问题。

#### 参考文献:

- [1] 万雄飞,司伟伟. 辽宁北镇市辽代帝陵 2012—2013 年考古调查与试掘[J]. 考古,2016(10): 34—54.
- [2]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医巫闾山辽代帝陵考古取得重大收获:发现一批辽代皇家建筑基址和高等级墓葬,确定辽乾陵、显陵位置,填补辽代帝陵考古的空白[N]. 中国文物报,2019-03-22(5).
- [3] 脱脱. 辽史·地理志[M]. 北京:中华书局,2016.
- [4] 叶隆礼. 契丹国志[M]. 北京:中华书局,2014.
- [5] 脱脱. 辽史·景宗本纪[M]. 北京:中华书局,2016.
- [6] 脱脱. 辽史·圣宗本纪[M]. 北京:中华书局,2016.
- [7] 脱脱. 辽史·兵卫志[M]. 北京:中华书局,2016.
- [8] 盖之庸. 内蒙古辽代石刻文研究[M]. 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
- [9] 脱脱. 辽史·兴宗本纪[M]. 北京:中华书局,2016.
- [10] 向南,张国庆,李宇峰. 辽代石刻文续编[M].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0.
- [11] 向南. 辽代石刻文编[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
- [12] 刘凤翥,王云龙. 契丹大字《耶律昌允墓志铭》之研究[J]. 燕京学报辑刊,2004(17):61—99.
- [13] 清格. 塔子沟纪略·艺文·宜州厅峪道院复建藏经千人邑记[M]. 沈阳:辽沈书社,1985.
- [14] 陈述. 全辽文:卷二[M]. 北京:中华书局,1982.
- [15] 王新英. 全金石刻文辑校[M].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2.
- [16] 阿桂. 盛京通志·艺文志·医巫闾[M]. 沈阳:辽海出版社,1997.
- [17] 赵秉文. 闲闲老人滹水文集[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
- [18] 王晶辰. 辽宁碑志[M].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

(下转第 141 页)